



韩玉峰艺术评论选

韩玉峰 著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玉峰艺术评论选 / 韩玉峰著

太原市：三晋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457-0630-7

定价 85.00

【中图法分类号】 J052-53（艺术＞艺术理论＞艺术评论、欣赏）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了我省著名作家韩玉峰先生的 68 篇艺术评论作品，包括综述 2 篇，戏剧曲艺 36 篇，音乐舞蹈 8 篇，美术书法摄影 12 篇，电视剧（片）10 篇。

【参考文献格式】 韩玉峰著．韩玉峰艺术评论选．

太原市：三晋出版社，2012.10.

序一 1978-2008：山西文艺 30 年的见证

1978 至 2008，改革开放的 30 年，是中国巨变的 30 年，也是我生逢盛世的 30 年。这 30 年，我只在两个单位工作，前 10 年在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担任干事、处长，后 20 年在山西省文联先后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顾问，荣誉委员，不大不小，也算个文艺行政“官员”。这两个单位都可以接触到全省文艺工作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天时、地利、人和，使我在工作中，结识了朋友，增长了见识。在众多师友的教诲和艺术熏陶下，形成了我浓厚的山西文化情结，也使我有机会成为改革开放 30 年山西文艺发展的幸运的见证者。

30 年，人的大半生，历史的一瞬间。回眸往事，感慨良多，浮想联翩，有大事，也有小事，无论大小事情，反映的都是 30 年的阳光雨露，30 年的快意和欣慰。

“老干部协会”

我是 1970 年 11 月从山西大学调到山西省委宣传部的。先在文艺处当了 10 多年干事。当时的文艺处只有一位副处长贺新辉，主持工作。处里的干事有曲润海和我。新闻处的干事有温幸、梁衡。1983 年实现干部年轻化，我当时已经 50 岁，被任命为文艺处处长。温幸被任命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新闻和文艺，成了我的直接领导，又是知己好友，后来多年我在温幸同志的领导下抓全省的文艺工作。曲润海被任命为省文化厅厅长。温幸和曲润海都是越级提拔的，从干事一直提到厅级领导干部。曲润海后来调任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成为全国著名的戏剧专家。梁衡调到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当站长，后来回到光明日报社，不久又先后担任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司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全国著名的散文家。我也于 1988 年 12 月被省委任命为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这都是得益于三中全会后党的干部实行“四化”的好政策，要不然我们这些老干部就可能终老干事，直至退休。所以梁衡当时戏说咱们成立一个“老干部协会”。

省第四次文代会

“文革”十年，山西文艺界同全国各地一样，遭到了空前浩劫。省文联和各个协会被砸烂了，刊物停办了，活动停止了，队伍打散了。许多知名的作家、艺术家成了“专政对象”，甚至被迫害致死。一个《三上桃峰》事件使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受到株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8 年 5 月，省文联召开了三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恢复了文联和各协会的活动。就在这一年的 7 月，省文化厅为“文革”期间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青年文

艺工作者赵云龙同志平反；这一年的9月，党中央为《三上桃峰》事件平反；这一年的10月，全国文联举行了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省委做出了为赵树理同志平反的决定。广大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重新唤起了生活的信心、生命的活力，投入党的文艺事业中。

三中全会后，山西文艺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80年4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第三次文代会是在1963年11月召开的，到开四次文代会相隔已经快17年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全省文艺工作者的第一次大会师。大家劫后重逢，欢聚一堂，充满了团结、喜庆的气氛。出席大会的代表多达1180名。会议时间长达半个月。会中套会，文代会期间有作协、剧协、美协、音协、摄协等4个协会换届，影协、曲协、舞协和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4月3日，大会在长风剧场隆重召开。王谦、罗贵波、阮泊生、武光汤等省四大班子的领导同志全部出席。省委书记贾俊在开幕式上讲话。省委宣传部部长刘舒侠在文代会全体党员会议上讲话。省总工会副主席杨子平、团省委副书记崔光祖、省妇联副主任高首先、省军区副政委冀敬先分别代表各自单位致祝辞。王玉堂同志致开幕词。马烽同志在会上做了题为《继续解放思想，繁荣文艺创作，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工作报告。西戎、贾克、苏光、洪飞、陈铿、龚书身、尹晓寒、张焕、高鲁等同志分别在作协、剧协、美协、音协、摄协、影协、舞协和民研会的会员代表大会上做工作报告。高沐鸿、贾桂林等作家、艺术家在各自的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言。郑笃同志致闭幕词。文艺界的各路领军人物齐聚省城，真可谓一代风流，群贤毕至，文坛艺苑，一片春意。令人感慨的是，2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些文艺界前辈大多已经作古，留在我心里的是他们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写在历史上的是他们在各个艺术领域里的重要贡献。这一切如在昨天。四次文代会闭幕后，《山西日报》发表了题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要鼓舞人民》的社论。省四次文代会在山西文艺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良师益友七作家

“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山西五作家，加上王玉堂（冈夫）和郑笃，是省委、省政府1992年授予“人民作家”称号的七位作家。这七位老作家是我尊重的长辈。我同他们都有比较密切的交往。

四次文代会筹备工作繁重，由马烽和胡正同志总负责。起草文代会报告就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我当时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当干事，马烽同志点名让我负责起草文代会的工作报告。经部、处领导同意后，我就住在省文联、作协大院小南楼上的一间房子里，算是借到文联工作。每天除去午饭和晚饭时下楼到灶上吃范师傅做的老不变样的刀削面外，就是关在房子里看材料、写东西。

文代会工作报告，我没有写过，请教马烽同志。老马谈了他的想法。他提出主要写两个

部分。一部分是历史的回顾，要回顾建国 30 年来我们的文艺工作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其中包括十七年文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工作面目发生深刻变化的三年。第二部分讲今后的任务。这是老马确定的文代会报告的总体思路。老马不仅在报告总体思路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且在具体表述上也讲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关于短篇小说的特征问题，关于“山药蛋派”的问题。他谈到山西的短篇小说大都具有新（反映新人新事）、短（形式简短明快）、通（语言质朴通俗）的特点。他谈到流派时说，山西有一个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有人把它贬为“山药蛋派”，但山药蛋也是一种食物，同样富有营养，作为一种流派也没有什么不好。老马的这些话，我几乎是原话写进报告里了。文代会报告初稿出来后，老马看过后很满意，稍加修改就定了稿。4 月 3 日，马烽同志在长风剧场省四次文代会上报告后，代表们反映很好。给领导人起草讲话、报告，对一个当干事的来说是平常事。领导人自己谁也不会有意地去说这个讲话是哪一位秘书或干事替他起草的。可是老马在文代会前后，会上会下，一提起文代会报告，就说“这是韩玉峰起草的”。这实在是愧不敢当。其实，报告的主导思想和整体框架是老马定的，报告中不少语言是老马自己的话，我只不过是把他的想法变成文字而已。后来这个报告在当时的《汾水》杂志上全文发表了。有一天，老马的夫人杏绵给我送来了稿费，一共 70 多元，我当时的月工资才 67 元。我说这是老马的署名文章，我怎么能要稿费。杏绵说，报告是你起草的，老马让把稿费给你。她执意让我收下，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在与文代会同时召开的省二次作代会上，我进入了作协理事会。老马还同老西商量，决定任命我为作协秘书长，调作协工作。由于部里领导不同意，我这个作协秘书长一天也没有干过。但令人感动的是马烽、西戎同志对我的信任和关爱，让我难忘的是马烽同志博大、高尚的胸怀。

我同西戎、胡正同志也有许多工作上的交往。在文联和各个协会恢复前，有个省文艺工作室，办公地点就在南华门东四条现在的作协大院。我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时，宣传部分管文艺处的领导，先是卢梦同志，后是刘江、张玉田、温幸同志。这些部领导民主作风都非常好，工作上信任、放手，我们基本上都是独立工作。我下去最多的地方是省文化局和省文艺工作室。我到省文艺工作室同西戎、胡正共同主持过电影创作座谈会和其他活动。当时省文艺工作室的人员非常精干，负责会务的只有顾全芳等一两个人。在工作交往中，老西的醇厚朴实、老胡的潇洒干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写出了《作家西戎印象记》和《作家胡正印象记》两篇文章。《作家西戎印象记》获得了首届赵树理文学奖散文二等奖。

束为和郑笃二老是我在省文联宿舍的邻居。左邻右舍，更是便于随时请教，成为我工作

上的良师。束为 1994 年 3 月去世，郑老 1996 年 8 月仙逝。我曾为束为魂归吕梁撰写碑文，由赵望进同志书丹，树碑于离石凤山。为了展示束为、郑笃同志 60 多年的文学创作成果，回顾他们在文艺宣传组织领导工作中的业绩，我受省文联党组和束为的夫人呼鸣、郑笃的夫人李秀琴同志的委托，分别与束为的女儿李肖敏、郑笃的女儿郑晓君共同主编了三卷本的《束为文集》和《郑笃文集》，先后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总结和研究山西文艺发展的历史积累并提供了一份珍贵史料，为广大读者了解山西文艺发展、走近人民作家提供了一部有益读物，也是我完成二老的遗愿，表达对老一辈作家的敬意，对山西文艺界做的一点有益的工作。

作家张平印象

张平是一位为时代呼唤、为人民代言，具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作家。他勤于笔耕、笃志好学、佳作不断、成绩斐然，成为山西新时期涌现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张平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山西省副省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是山西文学界的骄傲。

我认识张平大约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我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当处长，张平在省文联《火花》杂志社当副主编。那时他已经发表了《祭妻》《姐姐》等短篇小说，《姐姐》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已经是个很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1992 年 5 月，我搬到省文联宿舍，同张平成了近邻，对于这位敦厚诚朴、才华出众的青年就更多了几分熟悉和了解。我深为这位青年作家面向时代、关注人民、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和“永生永世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宗旨所折服。他仿佛在不经意间就出版了一部部大作。而且每出一部作品，都会引起社会轰动，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很快地被改编为影视剧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使他的小说创作拥有更多的观众、听众和读者。张平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时代的回响，深入生活的结晶；既是表现主旋律的杰作，也是占据市场的畅销书，成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1991 年《法撼汾西》的出版，1993 年《天网》的问世，标志着张平的创作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抒写“家庭苦情”转向了关注民间疾苦。1995 年，也就是因为这两本书，一些人对号入座，把张平推向了被告席，作家张平在北京打起了官司。在一次，张平赴京前告诉我，他在北京丰台人民法院打官司，脸上的表情是一片无奈。我安慰他，反腐倡廉是党中央的决策，你为老百姓说话，一定会胜诉，但想不到这场官司竟拖了两年多。打这场官司使张平感慨万千。最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撼和动情的是广大读者和群众对他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来自老家农民对他的支持。在一个大热天，几个临汾的老农民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丰台看望他。他们说，要是法院把作家张平判输了，宣判那天，他们全村的人都要来北京当众给作家挂匾。他们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咱们老百姓支持的就是像张平这样的作家。他们说死说

活要请张平吃顿饭，给他压惊。在一个很普通的小饭馆里，这些第一次来北京的真诚善良的老农民们竟然破例地点了8个菜，甚至给张平要了两份过油肉，让他好好补补身子，攒足了劲跟他们好好打！一瓶二锅头把大家喝得都满面通红。吃到后来，他们把那个时时抱在胸前已不知是哪个年月的人造革提包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裹了好几层的油纸袋，然后从油纸袋里抽出一沓钞票来，对张平说：“这是大家临时凑下的五百块钱，你先拿着用。咱们老百姓支持你，就是卖牛卖马也要帮你把这场官司打赢。”张平看着这由十块五块一块几角凑在一起的厚厚的一沓钱，好久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件事给张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每逢说起这件事，就不禁潸然泪下。张平通过这场官司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

2000年的夏天，根据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在全国各地上映，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成为大江南北的焦点话题和电影市场的全新景观。这年初冬，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标志着山西文学创作第三次高潮的出现。12月9日，省委宣传部召开“面向新世纪山西文学发展研讨暨张平文学创作表彰会”，张平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的光荣称号。这是继1992年马烽、西戎等7位作家之后，省委、省政府第一次把“人民作家”称号授予一位年轻作家。一位作家能有如此多的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能获得如此高的荣誉，能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观众和听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张平的作品适应了时代和人民的需求。我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责任和良知：作家的现代使命——从〈生死抉择〉的火爆谈张平的创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并获山西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批评家》和文学沙龙

山西的文艺理论评论工作有着优秀的传统，那就是紧跟时代步伐、关注作家作品，理论评论始终与创作同步。老一辈评论家如王中青、史纪言、郑笃、高捷以及李国涛等都有自己的建树，对山西的文艺批评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

山西文艺理论评论工作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标志性的大事就是文学批评双月刊《批评家》的创办和批评家队伍的形成。《批评家》创办于1985年4月，1989年底因全省刊物调整停办，共办了5年，出了5大卷31期。这份珍贵的刊物，记载着山西文艺批评界走过的道路，也反映了当时全国重视文艺研究和批评方法的更新、提倡批评方法多样化的思潮。刊物设置的“理论探讨”“作家与作品”“评评家与评论”“文艺批评理论和方法”“国外理论批评界”5大板块和“作家论”“评论家列传”“随感录”“我的批评观”“评新人”

等专栏，深受读者的欢迎。全国的一些著名学者、教授如阎钢、谢冕、曾镇南、林兴宅等都给刊物写稿，使《批评家》很快就在全国文艺界和批评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当时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每逢去作协办事，准要去《批评家》编辑部坐坐。主编董大中、副主编蔡润田都是我的好友。大中治学严谨，成就卓著，是赵树理研究专家，主编过《赵树理全集》，出版过多部有关赵树理的专著，是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在全国赵树理研究界很有影响。润田学养深厚，温文尔雅，是我在山西大学的校友。他俩以开放意识和创新的精神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

在编辑部让我最欣赏的是三位年轻人——杨占平、谢泳和阎晶明。他们使整个编辑部充满了生气和活力。杨占平，笔名杨品，对山西的作家从赵树理、马烽等老一辈，到代表“晋军崛起”的中青年一代，一直到“晋军”新锐，都十分熟悉，说起来，如数家珍，让人钦佩。占平如今已是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但他仍然笔耕不辍，不断有论著问世。谢泳侧重现代思想史研究，成为青年学者，被聘为厦门大学教授，为学界所重视。阎晶明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副主任，现任《文艺报》总编辑，是茅盾文学奖评委，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山西现在从事经常性专业或业余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评论家，不少是当年《批评家》的作者，如杜学文、段崇轩、席扬、康序、赵勇、丁东、邢小群、陈坪、李杜、杨矗、侯文宜、李有亮、郑伯光等。这些同志现在大都在各自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成为高等院校教授、研究生导师和学科负责人，还有的调到北京、上海、福建等地，成了当地批评界的核心人物。通过《批评家》这块阵地，吕梁师专、山西大学、山西师大、太原师院、晋东南师专等校都出现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批评家群体，成为今天山西评论队伍的中坚力量。

《批评家》停办了，但是山西的评论队伍并没有失散。从2005年开始，在杜学文和杨占平同志的倡导、组织下，以省作协为依托，由省城的部分评论家组成了一个文学沙龙，不定期地开展活动，使山西的文艺理论评论工作再度活跃起来，并在全国批评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经常参加文学沙龙活动的有省委宣传部的杜学文，省作协的董大中、蔡润田、韩石山、杨占平、段崇轩、谢泳、王姝、李金山，省文联的韩玉峰，省文化厅的孙钊、王辉、杨卫华，《山西日报》的李杜、关海山，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李建华，省社科院文学所的姚乃文、贾克勤、陈坪，山西大学的苏春生、侯文宜、王春林，太原师院的傅书华、杨矗，《太原日报》的杨士忠，等等。这些同志大体上说是由高校派的评论家和作协派的评论家两部分组成的，大都是事业有成、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不少人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

和《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但好像大家并不满足，有的到上海读博士，有的去北京做访问学者，还有的到鲁迅文学院进修，这就为沙龙不时地带来更多的新的文学动态和学术信息。每次聚会，互通信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具有浓厚的学术空气。韩石山的学识渊博、语言诙谐，杜学文的思想敏锐、见解深刻，段崇轩对文艺学、批评学和乡村小说的研究，杨士忠对文学现象的美学思考，王春林对长篇小说的研究，以及傅书华的批判意识、杨矗的谱系学说，等等，都使我学到不少的东西，包括一些新的思维理念、新的批评方法。

沙龙还对山西出现的文艺精品进行集中的突出的评介宣传，为推动和繁荣山西的文艺创作服务。如对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片《暖春》等组织大家撰写文章在《山西日报》上整版推出。沙龙还围绕某一主题，如文学教学、文学研究、文艺出版、戏剧文学等进行专题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今年年初，文学沙龙还组织评论家分两个组，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文学发展、思潮流派和发展趋向进行座谈讨论，写出了两篇较有分量的长文——《三十年文学思潮的回顾与反思》《三十年文学思辨录》发表在省内外报刊上。

文学沙龙，开展活动3年多，使全国批评界听到了山西的声音，显示了山西评论队伍的實力。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在我们沙龙其实不然。我们的文学沙龙是一个互相学习、砥砺切磋的场所，而绝无“文人相轻”的旧习。正因为这样，大家都热爱它，维护它，期盼着经常聚聚。

三晋艺苑竞芳菲

这30年，山西的戏剧、音乐、舞蹈、杂技等表演艺术领域里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而且是在全国拔尖的人才，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而且是在国内外打得很响的作品。“四大梆子”硕果累累，优秀剧作源源不断，话剧创作走向繁荣，整个戏剧舞台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景象。1978年9月，中央为《三上桃峰》彻底平反。一批被禁锢的剧目如《下河东》《打金枝》《金水桥》等恢复上演，一批新创作的剧目如《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油灯灯开花》《关公与貂蝉》《大脚皇后》等搬上了舞台，戏剧“三并举”的方针得到了真正的体现。现代戏如《风流父子》《唢呐泪》《山风》《丁果仙》《土炕上的女人》等，新编历史剧和古代故事戏如《杨儒传奇》《桐叶记》《斩花堂》《两地家书》《范进中举》等，改编传统戏如《打金枝》《挂画》《打神告庙》《苏三起解》《杀妻》《教子》等，成为深受观众喜爱、既上座又叫好、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特别是80年代中期，省文化厅提出“振兴山西戏曲”的口号，确定了以“艺术革新”为中心内容的综合治理的方针，进行了分剧种的“四大梆子”调演；定期举办的中青年演员评比演出、重大节日的献礼演出，以及作为山西戏剧品牌的“杏

花奖”评比演出等，都极大地促进了山西戏剧的繁荣和戏剧人才的培养。至今我省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人数已达40人，居全国第一；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我省有100位小演员获“金花”称号，同样在全国名列前茅；自1989年至2007年连续举办了11届的山西省“杏花奖”评比演出中更有多人获得“杏花大奖”“杏花表演奖”“杏花新剧目奖”等。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批艺术精品相继推出，如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话剧《立秋》、舞剧《一把酸枣》，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的京剧《走西口》，以及晋剧《傅山进京》、上党梆子《赵树理》、儿童剧《我能当班长》《刘胡兰》等剧目既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大奖，又有着很高的上座率，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话剧《立秋》和舞剧《一把酸枣》至今都已演出了400多场。

省里这些重大的戏剧活动，我有的是全程参加，有的是参与剧本研讨和作品座谈，还担任过一段山西电视台“走进大戏台”的评委，常常走在街上被戏迷们认出，成了社会“公众人物”。这一切活动使我对改革开放30年来山西的戏剧发展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也写了不少有关山西戏剧创作的理论探讨文章和剧评。如1983年发表的《开创我省戏剧工作的新局面》，1985年发表的《振兴晋剧调演后的思考》，1988年发表的《山西戏曲现代戏的新突破》，1989年发表的《现代戏的“晋军”崛起》等，还写了对“永葆艺术青春的剧作家”张万一、“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任岫云、“旷代绝艺一小旦”的田桂兰、“入耳悦目一青衣”的胡嫦娥等戏剧家的研究评论文章。

在表演艺术领域里，我最关注的还是山西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黄河”歌舞三部曲。这就是1987年的大型山西民歌舞蹈晚会《黄河儿女情》，1989年的大型山西民俗系列舞蹈《黄河一方土》，1997年的大型舞蹈诗剧《黄河水长流》。“十年磨一剑，谁解其中味”，山西歌舞剧院10年的奋斗和收获，构成了“黄河”歌舞三部曲，轰动了三晋大地和全国舞坛，成为献给母亲河的舞蹈经典，为当代中国舞蹈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在中国民族民间歌舞发展道路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多少岁月匆匆过，奔腾不息是这条河”，“黄河”歌舞三部曲是在继承优秀的民间歌舞的基础上，推出的一种充满时代精神、闪烁时代光彩的，为当代观众所接受的、全新的民族歌舞艺术。我不只一次地看他们的排练、演出，同主创人员座谈讨论，交换意见，他们成了我熟悉歌舞艺术的最好的老师。就是在这前后10年的时间里，我结识了省歌舞剧院的一大批艺术家。这里有舞蹈编导家王秀芳、金小平、冯玉梅、唐俊桂、岳丽娟、刘兴范、石家萍，舞蹈家宋拉成、宋升平、白波，歌唱家牛宝林、陕军等，作曲家张文秀、景建树，词作家赵越，舞美设计师王录宝等。特别是在《黄河儿女情》的主创人员中，有一位十分年轻的编导，

他就是现在全国著名的舞蹈编导家张继钢。他在舞蹈编创上展现了他的天分和才气。他创作的双人舞《元宵夜》在全国民歌民舞比赛中获得大奖。《黄河儿女情》中几个很受欢迎的舞蹈《杨柳青》《送情郎》《难活不过人想人》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省歌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张继钢，但是他在会上只是静静地听着，什么也没有说。后来得知他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再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舞蹈编导家，被中国文联授予舞飞天涯的“世纪之星”的称号。他献给北京舞院的毕业作品——民间舞晚会《献给俺爹娘》给当代中国舞坛带来巨大的冲击。他给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创作的大型歌舞《军魂》被称为军事题材歌舞晚会的里程碑。他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创作的《千手观音》走向了世界。他回到山西编导的大型舞剧《一把酸枣》，入选 2005-2006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十大精品剧目。这台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气派、山西味道的舞剧成为山西建设文化强省的标志性的成果之一。张继钢作为北京奥运会、残运会开、闭幕式的总编导之一，为祖国在世界上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在“黄河”歌舞三部曲陆续问世的 10 年里，山西的媒体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工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和《山西日报》文艺部对《黄河儿女情》进行了推荐演出。10 年里，我对“三部曲”的每一部都写过文章进行评论和赏析。如《醉人的〈黄河儿女情〉》《〈黄河儿女情〉的成功和启示》《山西民间舞蹈的复苏和走向》《对舞蹈艺术的发展和超越》《献给母亲的舞蹈经典——〈黄河水长流〉礼赞》《山西新时期舞蹈创作的又一重要成果——〈黄河水长流〉解读和赏析》《十年磨一剑，谁解其中味——写在“黄河”歌舞三部曲完成之际》，有的发表在《舞蹈》杂志上。我有关“黄河”歌舞三部曲的第一篇文章写在 1987 年，而最后一篇文章写在 1997 年，也是时间相隔 10 年。这些文章都是与舞蹈作品同步产生的。

银幕荧屏好靓丽

影视艺术是时代之骄子，是最接近群众的大众传媒，在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中，起着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山西的影视艺术，特别是电视艺术，完全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

山西电影起步很早。山西的第一部电影产生于 1935 年，是由西北影业公司拍摄的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故事片《千秋万岁》。山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是 1983 年拍摄的彩色故事片《神行太保》。改革开放前期，山西电影创作最重要的是马烽、孙谦联手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泪痕》（《新来的县委书记》）和被称为“新时期农村三部曲”的《咱们的退伍兵》（1985）、《山村锣鼓》（1986）、《黄土坡的婆姨们》（1987）。这几部电影反映了作者对新时期农村问题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马烽、孙谦之外，山西作家创作的农村题材电影，还有西戎、义夫的《金匾背后》，田

东照、罗贤保的《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王东满的《点燃朝霞的人》，郑义的《老井》。根据张平小说改编的《天网》、《天狗》（小说原名《凶犯》），也是属于农村题材的电影作品。华而实的《知音》（写蔡鄂与小凤仙的故事）则是在中国电影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优秀作品。这些电影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

1998年10月，省广播电视局调整了山西电影制片厂的领导班子，李水合担任了厂长，王向英担任副厂长。李水合以一种新的理念、新的作风，团结一班人，带领全厂职工，硬是闯出了一条有山西厂自己特色的办厂路子，使电影厂很快改变了面貌，并且在全国电影界赢得了地位和声誉。山西电影制片厂成为全国省办地方小厂的一面旗帜。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领导称“山西厂在全国电影厂中、省办电影厂中，像一匹黑马脱缰而出”，这是电影创作的山西现象。

1999年以来，山西电影制片厂共生产了67部故事片，前几年是每年生产几部，后几年是每年生产十几部，这几年是每年生产20部，连续几年山西厂每年生产的电影数量，仅次于中国电影集团，名列全国第二。此外，他们还生产了不少电影纪录片、科教片和大量的电视剧。他们生产的电影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多次获得国家大奖。他们有8部电影获得中国电影的最高奖——“华表奖”。山西厂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电影有“暖”系列的《暖春》《暖情》《暖秋》，被称为《暖春》三部曲。特别是呼唤人间真情的《暖春》上映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暖春》热，影片居全国同期发行量第一。这部投资只有200万元的影片，全国票房收入突破了2000万元。《暖春》不仅走红全国各省，而且发行到日本、朝鲜和港澳台地区，获得普遍好评，反映十分强烈。《暖春》成了山西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成果之一，成为山西电影的著名品牌。

除去《暖春》系列影片外，山西厂生产的《明天我爱你》《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走过严冬》《声震长空》《柳月弯弯》《生死托付》《江北好人》等影片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省委常委，时任宣传部部长申维辰同志总结山西电影制片厂成功的基本经验时指出，主要是：高起点精心策划，高层次整合资源，高质量组织实施。

为了配合对山西电影新作的宣传，我写了《山西电影的新收获——〈声震长空〉观后》《人间自有真情在——电影〈暖春〉观后》《建构中国电影的精品意识——从山西电影制片厂的〈暖春〉、〈暖情〉谈起》等文章，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还参加了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山西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调研活动，以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课题组的名义到山西电影制片厂进行调研，我与和悦同志执笔，写出了《以精品生产开拓电影市场》的调研报告。今

年是山西电影制片厂成立 50 周年，我正在主编书名为《银幕记忆》的纪念文集。

至于山西的电视艺术那完全是产生在三中全会之后。山西电视台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是 1980 年改编自蒋子龙的同名小说《祝你们幸福》。

山西的电视艺术大致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两个时期。

（一）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山西电视剧创作生产有 3 个主要特点：一是革命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取得了突出成就；二是紧贴时代、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电视剧创作成为山西电视创作的主旋律；三是以《新星》为代表的电视连续剧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1. 山西革命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是从 1985 年开始的。第一部作品是 7 集电视连续剧《上党战役》。1986 年和 1990 年两次召开山西省革命史题材电视剧研讨会，从理论上和艺术上探讨搞好革命史电视剧创作问题。这两次研讨会我都参加了。我还和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秘书长赵小萍同志一起制定了革命史电视剧创作和制作的五年规划。到现在完成了有 20 多部 200 多集，包括《上党战役》《烽火侨女》《尹灵芝》《大敌当前》《评梅女士》《战火在云城熄灭》《攻克太原》《忻口战役》《临汾攻坚战》《晋中大捷》《中国有个工人旅》《红军东征》《百团大战》《毛泽东过山西——十八日行》《刘胡兰》等。省委宣传部和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为了纪念建党 70 周年，配合对广大青少年和党员、干部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把已经拍成的革命史题材电视剧进行了选编，编成了一套 20 集的山西省革命史题材电视系列剧精编版教育带——《丰碑》，发行到全省各地。

2.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张绍林、张纪中和石零组成的创作集体，拍摄了一批紧贴时代、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电视剧。如《无字的歌》《太阳从这里升起》《大西北人》《咱们的老郑》《好人燕居谦》《白色的大雁》《刑警队长》等。张绍林还拍了一些 4 集的中篇电视剧，如《百年忧患》《沟里人》。这些中短篇电视剧多以山西为背景，着力开掘普通人崇高的精神世界，充满昂扬的激情。

在张绍林创作集体的影响下，山西的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导演也相继推出了一批优秀的短篇电视剧。如高建国的《百岁老人侯佑诚》，孙亚舒的《一个医生的故事》《梁世奎》，刘庆梅的《我的奶奶》《卜宗亮》《小点》，牛建荣的《小村风景》（包括《画画》和《风铃》两个短剧），还有晋中史和平、王松山的《地委书记》，太原谷锦云的《生死之恋》，阳泉张跃平的《彩玲》等。

3.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也出现了部分电视连续剧，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太原电视台拍摄的 12 集电视连续剧《新星》。1986 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的《新星》，引起全国性的大轰动。

90年代，我省先后推出了电视连续剧《黄河情》（14集）、《杨家将》（32集）、《吕晋源票号》（10集）、《情洒太行》（9集）、《郭兰英》（12集）、《康熙遗妃五台山》（25集）、《丁果仙》（10集）等。这说明，到了90年代，山西的电视剧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式上由短篇发展到长篇，内容上由主要是反映现实生活扩展到历史故事、社会变迁、商贸文化，显示了题材的多样化，特别是重视了电视剧的可视性，体现了电视艺术的发展和进步。

（二）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电视艺术大发展的主要标志是，长篇电视剧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大部头作品。

这几年生产的长篇电视剧数量很大，质量也很高，有不少达到了精品的要求。如山西电视台拍摄的《别拿豆包不当干粮》25集、《八路军》25集、《乔家大院》45集、《亲兄热弟》30集、《文化站长》26集，以及反映公安题材的《水落石出》系列片。省电影制片厂的《福贵》33集、《我的美丽生活》20集、《好人李成功》28集。还有省作家协会的《赵树理》17集，省文明办的《喜耕田的故事》19集。黄河影视社拍摄的“女性三部曲”也叫“和谐三部曲”，包括《阿霞》20集、《云娜》57集、《黑金地的女人》27集。此外，如太原的《一代廉吏于成龙》19集、《渴望激情》19集，大同的《凤临阁》30集，吕梁的《吕梁英雄传》18集，晋城的《铁血长平》34集，等等。

这些长篇电视剧的出现，一是成为代表山西建设文化强省成果的精品，二是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电视剧得到高度评价，大大提升了山西的形象，扩大了山西的影响，显示了山西文化的实力。前者如2005年、2006年播出的《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八路军》《吕梁英雄传》《乔家大院》和《赵树理》，后者如2007年播出的《喜耕田的故事》和《文化站长》，还有今年播出的反映矿工生活的《黑金地的女人》。这些电视剧融入了山西的优秀文化精髓，充满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充分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既有时尚因素，又无低俗成分，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艺术价值。特别是这8部长篇电视剧都是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扩大了电视剧的影响。

这些年，我看了大量的影视文学剧本。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省委宣传部举办的全国戏剧、电影、电视剧征文中，我集中时间阅读了60部1100多集电视剧征文剧本，不时发现让人眼睛一亮的好本子，为这些作品独特的题材、好看的故事、鲜活的人物、深刻的内涵，以及生动的语言所振奋。在应征的电视剧作品中涌现出一些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都比较好的作品。这次获奖的30集电视连续剧《老醋坊》、20集电视连续剧《喜耕田的故事》和24集电视连续剧《爸爸你要爱妈妈》就是其中的优秀之作。

这些年，在评论工作中我更多关注的也是影视作品，在这方面写了大量的文章，几乎山

西每有一部新作问世，我都会随之写出文章，进行评说。所以，对山西影视创作、生产的态势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也更加引起我对山西影视艺术的兴趣和期待。

我把我写的影视评论文章和其他有关文学、戏剧、舞蹈、美术等方面的文章编成了两本书。一本是 1992 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山西文坛百篇》，一本是 2005 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西艺谭》。这两本被评论界认为与山西文艺发展同步的书，也是从一个侧面对改革开放 30 年山西文艺发展繁荣的反映。

2008 年 11 月 4 日

序二 艺术创新和精品生产——兼评山西近年来涌现出的几部艺术精品

文化创新是一个时代命题。因为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即以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体和驱动力。而只有体现与时俱进精神的文化创新才能承担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艺术是文化的一种。艺术创新无疑地包容在文化创新之内。艺术创新所展现的成就，当然也会映射出文化创新的光彩。

艺术创新是时代的要求。艺术不创新就无法适应充满创造精神的时代和满足群众不断提高的审美要求。艺术创新也是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艺术不能趋同，只能求异，求异就必须创新。创新是艺术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

艺术创新是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即内容要有新意，形式要有新貌。艺术创新更是思想和理念的创新。这种创新的思想 and 理念要站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高度，以全新的视野、全新的思路和多维的角度，去审视人类文化的历史遗存，把握艺术发展的趋向，创造一种既适应时代发展又符合艺术规律的具有世界眼光的全新的艺术。艺术创新的终极目的是促进艺术精品的生产，打造富有生命力的强势文化品牌。

这种艺术精品应当是符合“二为”方向，唱响时代主旋律，“贴近现实，贴近时代，贴近群众”的艺术。这种艺术精品应当是具有先进文化品格，融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这种艺术精品应当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三精取向”的艺术。这种艺术精品应当是紧盯市场，能够占领市场，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效益”的艺术。总之，这种通过艺术创新生产的艺术精品，它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它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是真正能够做到“异地共享，异时共存”的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山西出现的几部艺术精品，如“黄河歌舞三部曲”、长篇小说《抉择》、蒲剧《土炕上的女人》、电影《暖春》、戏曲电视剧《村官》等，无一不是体现了艺术上的创新，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具象化展示，是代表山西形象、反映山西艺术水准的精品工程，是建设山西文化强省、打造强势文化品牌的生动体现。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解放的大形势下，山西的艺术家们适应时代的发展，尊重观众变化了的审美情趣，在继承优秀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大胆吸收有助于表现时代风貌的旋律和舞蹈语汇，推出了一种充满时代精神、闪烁时代光辉的，全新的歌舞艺术，这就是从 1987 年

到 1997 年，整整十年，山西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黄河歌舞三部曲”——《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和《黄河水长流》，创造了一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民族风格与时代特色融为一体的民族风情舞蹈，为中国舞蹈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道路上竖起了一座丰碑。难得的是它在参赛评奖中和演出市场上实现了双赢。《黄河儿女情》获得文化部颁发的“文华新创作节目奖”，《黄河一方土》在上海艺术节上夺取了艺术节唯一的“露美·花冠”奖大奖，《黄河水长流》获中宣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文化部第七届“文华新创作剧目奖”。“黄河歌舞三部曲”的部分节目还两次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亮相，使全国亿万观众能够通过荧屏一睹山西歌舞的风采。《黄河儿女情》1987 年 8 月在太原文化宫两周内就演出了 26 场，创造了省歌舞剧院在一个剧场连续演出场次的最高纪录。《黄河儿女情》和《黄河一方土》还在国内外前后演出了三百余场，《黄河水长流》演出近百场，可以说是倾倒了大江南北，走红了海内海外。时间过去一二十年了，演员换了一批又一批，“黄河歌舞三部曲”中的部分节目至今仍出现在舞台上，成为省歌的保留节目，而且常演常新，经久不衰。艺术创新意识和创新理念在“黄河歌舞三部曲”的创作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1997 年 8 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抉择》是张平 90 年代的一部重要作品。在《抉择》这部 40 多万字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里，张平紧紧抓住反腐败这一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表现了作家直面现实的理性精神和艺术勇气。它的出现，是张平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和超越，是张平从“家庭苦情”的系列小说到直面现实的长篇巨著中的扛鼎之作，是张平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创新的重大收获。《抉择》一问世，便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第一次印刷虽高达 10 万册，不久即告脱销。同时，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并被近百家报纸转载、上百家电台连播。特别是 2000 年的八月盛夏，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抉择》改编摄制的电影《生死抉择》在全国各地上映，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成为大江南北的焦点话题和电影市场的全新景观。短短几周，全国票房收入就突破数千万元，遥遥领先于同期放映的进口大片。而电影的火爆反过来又促进了小说的畅销。小说《抉择》一度在上海书店脱销，群众出版社紧急加印，方才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从小说《抉择》到电影《生死抉择》，是文学与小说联姻，走近读者和观众、走向市场的又一成功范例。

张平的《抉择》在获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精神效益的同时，《抉择》在全国性的评奖中先后获得 1999 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全国公安题材文学类一等奖、《啄木鸟》一等奖、全国最佳畅销书奖，并被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六部委推荐为建国 50 周年重点献礼的 10 部长篇小说之一。特别是 2000 年的金秋十月，张平的《抉